

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刘建江, 罗虹钧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挑战。

关键词:美国战略焦虑;中美战略竞争;美苏争霸;美日竞争;全局性焦虑

[中图分类号]F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2-0076-13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2.009

American National Strategic Anxiety and Containment Measures towards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u Jianjiang, Luo Hongju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x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al strategic anxiety since World War II, following those towards Soviet Union and Japan. The first strategic anxiety was based on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few economic interse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urse of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ly carried out economic blockade, arms race, public opinion war, and value subvers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resorted to the power of its allies in an all-out confrontation. The second anxiety against Japan is limit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and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cracking down on Jap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aging trade war, and overall forcing Japanese Yen to appreciate. The the third strategic anxiety and response measures towards China are more global and radical, involv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ntainment on economy, politics, military, ideology, public opinion, etc. which is an organized and systemat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applying international rules led by the United-States and his global allies. In this regard, China need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收稿日期:2023-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JL009)

作者简介:刘建江(197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研究;
罗虹钧(199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美经贸关系。

on its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fully absorb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former two cases, and make full preparations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while firmly adhering to its own development path,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its own strength to respond the uncertain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merican strategic anxiety;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Soviet hegemony; US-Japan competition; global anxiety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且经济规模不断与美国接近,美国对中国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二战后对苏联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焦虑。所谓国家战略焦虑,是指一国在发展进程中因外力或外在因素改变而使其核心利益、既有路径与发展趋势面临长期性的直接或潜在战略威胁,而对主流意识领域产生普遍性、持续性的认知焦虑,且被认为将对该国发展造成当期的或潜在的、实质性的负面冲击,必须采取必要举措予以化解^[1]。其中,美国的战略焦虑尤其对华战略焦虑广受关注,且对全球政治经济影响深远。这种焦虑源于美国雄厚物质财富、绝对军事能力,以及“灯塔之国”光耀下普世价值观维护者、国际秩序规则制定者、民主制度与发展模式典范等自我定位,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从而产生了全方位的对华战略焦虑。

历史经验表明,二战后美国以超越世界GDP一半的份额为基础,主导制定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通过军事、金融和文化霸权长期主导世界,并不断消弭其他国家对其绝对领导地位的威胁。在20世纪中晚期,美国也经历了两次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源自苏联及其领导的华约组织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这形成并导致美国对苏战略焦虑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第二次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深度恐慌,由此产生对日战略焦虑。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焦虑消散。与此同时,长期对日的“遏制”使日本陷入“失落的十年”,

由此,美国基本缓解了对日战略焦虑。20世纪90年代,美国享受冷战后的“和平红利”,以一国独霸的巨大优势进入21世纪,再度占据全球GDP约三分之一份额。

21世纪初,美国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景气在新世纪初期遭受NASDAQ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而消逝。二是“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导致美国将反恐置于首要任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霸权下滑的标志^[2]。三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空心化、虚拟经济增长、赤字经济模式等问题的显露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自信心,也暴露了其对世界的掌控不再如以往^[3]。扎卡利亚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终结^[4]。四是中东乱局,让世界认识到美国所谓的“灯塔”光芒不过是其维护利益、掠夺资源的民主输出与战争幌子。与此同时,21世纪初的中国,借“入世”之机迅速崛起,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约40%。从2016年开始,中国快速趋近美国GDP三分之二份额,已接近美国的战略焦虑临界点^[5]。在这一大趋势下,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显现并不断加深。

从历史来看,这一战略焦虑的最初迹象可溯至2009年7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启动,其典型举措是激化亚太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这标志着新世纪美国对“反恐”战略反思后的初步调整,并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产生了潜在担忧。2014年5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梦”大构想,宣称“领导世界一百年”,这可视为美国战略焦虑的直接表达,是作为老牌大国对新兴

大国“中国梦”的回应,同时也表明美国意欲应对潜在的战略焦虑。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成为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6]。而后,到拜登政府执政至今,美国对自身霸权可能迅速旁落的对华战略焦虑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由此,引发了一个当前广受关注的问题: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可谓二战以来美国第三次全面国家战略焦虑。比较对华战略焦虑同前两次战略焦虑的成因及化解举措,有助于我们挖掘美国对华贸易战及经济“脱钩”举措不断升级的根源,也有助于我们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二战后美国两次战略焦虑及化解回顾

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两次战略焦虑,我们可以据此总结美国对其他国家战略焦虑的一般规律和演进趋势的经验,并归纳美国的一般性举措。

(一)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

美国首次战略焦虑源于美苏争霸。二战后,虽然苏联的GDP总量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大实力使其成为全球主导权的挑战者。这导致了美国长期的战略焦虑,标志性事件是丘吉尔在1946年的铁幕演说,由此开启了冷战时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将遏制苏联视为核心战略,一直持续了长期的冷战。

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可谓是美国此种战略焦虑的直接表达。虽然美国掌握了与苏联对抗的主动权,但未取得绝对优势,苏联在全球安全、全球治理和价值观等领域一直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为此,美国动用全球盟友资源开启了全方位对苏遏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其一,全方位的经济遏制战略。自1950年起,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设置了多重枷锁与障碍,试图将苏联排

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为此,它们专门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美国对苏联的经济遏制战略除了限制苏联获取全球资源之外,还通过出口管制法禁运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产品。在这种严格的贸易管制下,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下降,几乎没有经济联系^[7]。为了进一步削弱苏联战略资源,扩大自身实力,20世纪70年代,美中建交并进入了“蜜月期”,期间,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外交“压舱石”。

其二,激烈的军备竞赛。一是模拟可能的战争,不断研制新武器和技术,发动代理人战争以及挑起战争,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二是美国超前部署和利用欺骗手段来升级军备竞赛,例如,美国提出“太空大战”理论并启动“星球大战”计划,以迫使苏联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太空探索。军备竞赛导致苏联产业结构失衡,轻工业领域滞后。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当时不断宣扬“航母无用论”,鼓励苏联领导人将资源投入到潜艇研发中,导致苏联陷入“航母困境”。

其三,舆论战、价值观颠覆与文化渗透。一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舆论,丑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形象,使用“铁幕”等词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其描绘为“洪水猛兽”,损害其国际声誉,并在美国国内的电视节目和文学作品中抹黑苏联形象,放大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二是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进行内部渗透,通过丰厚利益来策反苏联高官,并大肆宣传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动摇苏联高官对苏联体制的信心。三是通过各种文化产品向苏联民众进一步传播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极力夸大苏联国内服务和产品的匮乏情况,削弱苏联统治的基础。

最终,这些策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至此,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享受了冷战后的“和平

红利”,巩固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基础。基辛格认为,通过对苏联的漫长遏制,美国成功化解了苏联的挑战,阻止了其军事和政治的扩张能力,并且有效地管理了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确保了美国政治权力的稳定^[8]。至2018年,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的名义GDP仅相当于美国GDP的8.1%,已不再构成美国战略焦虑的威胁。^①

(二)美国对日本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逐渐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主义工业国,其GDP所占世界份额由1970年的7.09%上升至1991年的15.04%,逼近美国当年GDP的三分之二,引发了美国对经济霸权不保的战略焦虑。1994年,日本GDP世界份额占比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的17.92%。1995年,美国GDP为7.64万亿美元,而日本GDP为5.5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2.64%,已达到挑战美国国家经济规模的临界点。20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企业更是一掷千金购买圆石滩、洛克菲勒中心等美国标志性项目,这些被描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引发美国恐慌。与苏联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战略焦虑不同,日本带来的战略焦虑主要在于对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的挑战。

美国对日本战略焦虑化解方式集中在经济领域,因为两国并不存在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与道路分歧,所以美国对日战略焦虑的化解之道是利用日本对其市场的高度依赖以及巨额的贸易顺差,将自身的贸易逆差劣势转化为双边贸易摩擦优势,通过全面遏制日本经济来化解战略焦虑。

其一,采用多种手段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一是直接制裁。美国利用其广泛的情报网络,以“巴统”为名控告东芝向苏联出口机床,导致其被重罚和其工作人员被逮捕。二是

指控关键人物。1982年,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及三菱员工,指控其涉嫌窃取IBM公司技术。三是加征芯片关税,继续利用反倾销等手段,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打击日本半导体竞争力。四是施压迫使日本开放芯片技术专利,使之失去技术竞争力。五是大力扶持包括富士通在内的其他企业,培育竞争者。六是成立排除日本光刻机龙头尼康、佳能的联盟,并进行市场倾斜,最终导致日本光刻机龙头企业被荷兰阿斯麦公司反超。七是直接签订对日不利协议。1986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外国公司5年之内在日本获得20%的市场份额。另外,里根政府还打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Fairchild计算机公司。

其二,采取无休止的贸易调查来限制日本的出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共进行了15次调查,涵盖汽车、钢铁、电信等多个领域。1987年,美国直接对日本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总值高达3亿美元,关税率达100%。

其三,通过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本的整体竞争优势。1985年的“广场协议”被视为是美国“制造”的重要手段,旨在制约日本的持续发展^[9]。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动员全球盟友资源来遏制另一盟友的典型案例,与北约对抗苏联的模式相似。在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失落的十年”。截至2007年,日本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31%,2017年下降到美国的25%,2022年降至美国的16%。显然,作为挑战者,日本也已失去了成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地位。

三、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的形成

自中美建交以来的四十多年,美国一直采用以“接触”为核心的对华战略^[10]。这一战略包

括战略克制和经济自由主义两个要素,主要通过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来引导中国在各领域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以及与之相对的美国衰落,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发生变化。

(一)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向“接触+遏制”及“遏制”转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是由“接触”向“接触+遏制”转变。这一转变的转折事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后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开启则标志着向“接触+遏制”转变,其直接手段是不断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美国对华战略已基本偏向“接触+遏制”战略,既保持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又在关键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在Blackwill等发布的《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中,中国已被列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其主张从支持与合作向施压与竞争转变^[11]。特朗普执政后,迅速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外交顾问Gray等认为,前“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够强硬,军事遏制力度不足,对中国威慑作用有限^[12]。因而,他们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倡导“以实力谋和平”,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7年,美国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凸显“遏制”的战略共识^[13]。同年3月,美国国会宣布结束“亚太再平衡战略”,采取“遏制+接触”战略,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的“地位焦虑”^[14]。

第二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是由“接触”向“遏制”转变。这一阶段的关键事件包括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政治上对台湾和南海的强化。2018年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囊括了禁止从中国采购敏感材料、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通信与监视设备、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

习等诸多内容,并多次提及中国及中国台湾。该法案要求全方位进行“中国关注”,再次明确了“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第1261条),并推出“全政府对华战略”,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此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的演讲中针对中美贸易争端、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海外投资等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指责。Rudd认为,这一演讲代表美国对中国四十多年战略“接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中进入战略竞争期^[15]。

(二)全面战略焦虑伴随全面对华遏制战略开启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趋近或超越了预期,这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建制派出身的拜登总统曾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众多学者一度认为其上任后将基于对华“接触”理念来推进中美关系,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事实表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延续了前政府的战略方向。不同之处在于,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寻求国内两党合作,同时积极与盟友合作,动用全球资源来实施对华脱钩和多领域施压。为此,美国构建了基于价值观、特定技术领域、特定地缘等为基础的多个排华性联盟,这与二战后对付苏联的手段相似。张宇燕等将这一中美关系的质变描述为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调整为“规锁”^[16]。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加速,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在这一局面下,中美贸易战和科技竞争进一步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多个以“排华”和“遏华”为目标的美国主导组织涌现,全球性的对华“遏制”行动逐渐展开。拜登政府在近三年内持续升级对华遏制措施,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不断加深。2022年8月,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同年10月,美国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唯一全球竞争对手”,宣称未来十年将决定中美竞争的结果,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和冷战思维^[18]。同年12月23日,拜登正式签署《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大量涉及中国台湾问题的内容。2023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牵涉中国台湾和中国领土问题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破坏了中美政治互信和合作的基础。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正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从2022年12月开始,美国设立了多个机构和委员会专门处理中国事务,主要包括:国会的“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国务院的“中国小组”、CIA的“中国任务中心”、五角大楼的“中国工作组”,以及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特别是成立于2023年1月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宣称旨在通过与外交委员会、军事及情报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加强协作,更协调地应对中国问题,实现“帮助赢得对华竞争”的“雄心”。由此可见,中国问题已成为美国超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关切。美国正在不断加强在地缘政治、金融、科技、舆论等方面的对华遏制措施,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结合,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这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正在全面升级。中美关系正经历全局性、全球性的竞争状态,有滑向“新冷战”之势。

四、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一)经济上以贸易战为核心全面推进对华经济层面“脱钩”

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遏制有着对日本进行战略遏制时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美国对

华战略遏制的核心表现是中美全面贸易战,涵盖金融、产业和科技等领域,旨在实现中美全面的经济“脱钩”和“断链”。此外,美国还强调其价值观,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排挤中俄,以促进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和“断链”。

1. 中美贸易战

美国借鉴了对付日本的经验开展对华贸易战。此举是基于顺差国常处于弱势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将同日本一样作出让步。始于2018年3月23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上升至中美全面贸易战。尽管经历了多达12轮的谈判,但美国仍三次改变立场,不断升级冲突,反映了其不稳定性和常用策略。美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其对美国市场的重大依赖,美方希望借助逆差国家所拥有的话语优势,迫使中国让步。但美国的施压遭到中方的同步对等反制,导致其损失超过收益。

2. 重点打击关键核心领域的龙头企业

一是对中国的打击主要集中在5G领域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华为和中兴,这与过去美国对付日本的策略一致。自2018年以来,美国共对华为实施了四轮不断升级的制裁,最终于2022年底迫使美国企业向华为“断供”芯片,这远超以往对日本企业的打击程度。未来,美国可能继续加强对华为等龙头企业的制裁,包括切断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合作。

二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普遍实施制裁,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截至2023年3月底,已有1110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几乎覆盖了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核心环节。2022年10月15日,美国将36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的21家人工智能芯片企业,以此强化对它们的限制,并试图切断中国与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联系,包括上

游生产设备、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下游芯片成品等,旨在将中国从全球芯片产业链中隔离,形成所谓的“芯片孤岛”。

三是采取了对特定人群的制裁措施。例如,2018年12月,美国非法扣押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此外,在2022年10月14日,美国还宣布了禁止美籍专家任职中国半导体行业,意在全面扰乱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同时,美国还限制了中国学生进入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等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学习或交流。

3. 全球布局打击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中国关键产业

美国着力遏制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中国关键产业发展。除上文提到的对核心技术打击、实施“实体清单”限制、强化技术禁令等,还有以下两点策略:一是对半导体产业进行中长期布局。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发布了“国家安全护栏条款”,旨在限制受政府支持的企业在十年内不得与中国半导体相关领域开展重大交易或扩大高端芯片产能。二是不遗余力谋划半导体全球布局来围堵中国。尤其是通过建立芯片“四方联盟”来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合作,以协调产能供应、共享技术和标准、设备和材料供应,并同步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一系列手段旨在构建全球半导体壁垒,阻碍中国的崛起,并将半导体产业链的各环节掌握在美国手中。

4. 联合盟友共同推进对华经济竞争

美国借鉴对付苏联的经验,积极联合盟友对抗中国,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和“国际秩序的长期挑战”。他们以“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可靠”为幌子,组建各种排华经济圈子,采用“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墙”政策。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创建“俱乐部”式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动员全球资源推动对中国的“脱钩”,这些成为美

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一是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侧重共同价值观,高举意识形态旗帜。美国力图用共同价值观来巩固传统盟友的团结,共同对抗中国,并寻求以基于价值观的全球化取代基于市场和规则的全球化,如清洁网络计划、数字联盟、5G联盟等数字竞争的新组织。

二是启动“印太战略”。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目标是维护“实力优势”和“领导地位”,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并增强与同盟伙伴的关系网络。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印太经济框架”应运而生,被视为美国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工具。在地缘层面,“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更好地同中国竞争,特别是通过重塑供应链,构建美国—日韩—印度+东南亚的供应链系统,以间接排除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政治与军事上化解战略焦虑举措

中国既是经济大国,又是军事大国。美国因此产生的对华战略焦虑与对苏联和日本的战略焦虑地化解举措不同。

1. 整体上的武力遏制举措

一是军事恐吓。借鉴对付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实施对华军事恐吓,如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显示其在战略上已有布局。一些美国官员甚至提到只有通过“武装冲突”才能阻止中国的强大军事力量^[18]。

二是提升军费开支。2019年度,美国军费预算增至7160亿美元,创下里根时代以来的最大涨幅,超越了军费预算排名位居美国之后的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到2023年3月底,美国的年度军费预算达到了84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三是扩大反华盟友和友好国家圈子。这包括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通过渲染中国“威

胁”来争取欧洲盟友的支持,并在北约峰会上讨论中国的“安全影响”。此外,美国还推动了亚洲“小北约”的构建,继续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并组建了以美、英、澳为核心的“AUKUS”和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QUAD”。至今,美国还在持续推进“印太战略”,试图将更多非盟友纳入对抗中国的准军事同盟,并将中国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布局中。这些“努力”旨在形成一个“全面有效”的对华准军事同盟。

2. 局部升级“台湾牌”与“南海牌”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限制国际力量向中国倾斜,增强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企图通过这些举措瓦解中国的领土完整、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以达到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一是通过升级“台湾牌”,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这包括通过美国立法来获得法理支持,如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通过“台湾保证法”和“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议案等^[19]。同时,美国还不断增加对台军售规模,频繁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升级官方往来^[20-21]。2022年8月2日,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爆发;2022年底,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②发布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底线的相关内容;2023年4月,蔡英文窜访美国更是加剧了台海动荡。这些行动表明,美国对台政策的升级和强化,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之点。

二是升级“南海牌”。南海问题作为美国对华施压的手段,主要以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为理由。其举措包括: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公开报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与威吓活动”,将南海问题作为对华遏制的抓手;2022年,美军共派出约600架次军机,在南海上空近距离搜集情报;2023年初,美国和菲律宾还达成新的军事合作,美军意图在菲律宾巴拉望岛、

吕宋岛在内的区域增设4处军事基地,直接增加在南海地区对中国的压力。此外,美国和一些盟友还在涉港、涉疆、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些举措显示美国试图通过多方面手段限制中国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

(三)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对华竞争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竞争是美国对付苏联的“法宝”之一。基于此,美中竞争还增加了意识形态与制度层面的纠葛,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美国不遗余力对华竞争的战场。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经济领域的竞争不同,美中竞争的主要焦点之一是制度和价值观。综合实力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担心美国搞“和平演变”,损害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22]。

1. 贸易规则与价值观挂钩

美中竞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权力较量。美国将自身制度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当面临问题时,美国会指责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俄的制度和民主体系。面对中国不断崛起之势,美国不断攻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并试图抹黑和污名化中国的成功。美国政府甚至声称中国正在输出其审查制度和政治观念到其他自由世界国家^[23]。拜登政府借俄乌冲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推动西方国家形成所谓的“价值同盟”,强调“以我划线”的价值观贸易,构建“小院高墙”的格局。同时,美国试图在贸易领域利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市场经济地位”与贸易挂钩,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并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一策略可能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对华政策和全球价值链重新塑造的关键工具。美国政府还向国会提交报告,指责中国的经贸模式违反WTO原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24]。此外,美国还强调要用“数字民主”对抗“数字威权”^[25],将数字

化领域的价值观纳入竞争中。

2. 攻击中国“一带一路”输出“模式”

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美国积极推广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至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试图引导政权变革,如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激起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然而,这些“努力”导致相关地区出现政局不稳、经济困难及社会动荡。例如,南斯拉夫解体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民生水平下降,安全状况恶化,影响扩散至叙利亚等周边国家。美国还参与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耗资巨大,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26]。这些事件表明,美国的民主输出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集中精力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方面,中国更是表现出了制度优势,迅速控制了疫情传播,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因此,美国不断试图通过强调价值观差异来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构建对华的围堵联盟。美国的竞争目标不仅仅是遏制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置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

3. 借俄乌冲突生事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国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舆论战强度,化身所谓“和平卫士”,强调“民主与威权”的对抗,试图将俄罗斯贴上“原罪”标签,营造悲情氛围。2022年6月7日,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鲍尔公开声称中俄为“威权政府”,鼓动西方国家捍卫“民主”来对抗“威权”。然而,美国又与盟友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甚至包括集束炸弹等重型武器。同时,美国也积极诋毁中国,宣称中国“站队俄罗斯”,并表示有“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证据,试图在舆论和价值观层面制造冲突。

五、美国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异同性

(一)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相似点

当前,美国正处于对华竞争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且是综合了前两次战略领域的更深层次的全面战略焦虑,与此伴生的也是全方位的对华战略遏制。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相似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源于守成大国对挑战大国的焦虑

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一个重要症结缘于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历史上大国崛起可能引发的潜在挑战,这种挑战源于崛起国家与现有霸权国家之间的竞争。Onega建构了一个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竞争逻辑并指出,霸权国往往比崛起国更易于产生战略焦虑,并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从而增加冲突的风险^[27]。尤其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作为现有的霸权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威胁到其霸权地位,甚至可能在未来被中国取代其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地位。

2. 美国动用盟友力量对付挑战国家

在冷战时期,美国面对苏联这一强大对手,成立了北约组织并以此为基础采取了全面的联盟战略。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面对了日本崛起的挑战。在对待日本时,美国采取了侧重经贸冲突的策略,签署“广场协议”、成立“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来解决贸易不平衡和协调应对经济挑战。目前,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也在采用类似的联盟策略,通过积极整合盟友和非盟友,调动全球资源增强遏制力,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例如,美国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同时,美国还在如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中积极行动,以协调对中国的政策。

总的来说,美国对抗挑战国家时,均借助联

盟策略动员盟友和非盟友的力量来加强遏制力和应对挑战。这一策略在美国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联盟策略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帮助美国应对新的挑战。

3. 战略竞争均经历了漫长时期

战略竞争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持久现象,经常伴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争夺。如美苏冷战、美日贸易战,以及当前的中美竞争。这些竞争通常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塑造了国际关系的走势,并深刻影响了各国的政策和战略。美苏冷战是20世纪最显著的战略竞争之一,长达四十多年。冷战结束后,美国转向了对日战略竞争,其战略焦虑地化解也历时近二十年。当前的中美竞争也被视为一场漫长的竞争,美国对中国存在全面的战略焦虑,包括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安全等领域。这一竞争预计随着中国持续崛起将长期存在。

(二) 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差异性

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差异性主要取决于美国与竞争对手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同。

1. 竞争对手国家属性不同

苏联是美国认定的极权国家,其以权力至上原则(权力逻辑)为基础,权力逻辑主导国家行为,难以集聚对抗美国的战略资源,在外来强大压力下容易导致极化进而使国家崩溃。日本则是美国认定的自由市场国家,遵循资本至上原则(资本逻辑),同样容易产生极化现象,但由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上紧跟美国,因而在面对美国遏制时仅在经济层面退让。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至上原则(人本逻辑)为基础,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有序发展,避免了国内极化现象。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助于实现国家复兴。这些

因素使得美国的对华遏制难以奏效,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战略焦虑。

2. 美国与不同对手之间的交集不同

美国化解对苏联的战略焦虑之时,双方几乎没有经济上的交集,只有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军事、制度等领域的冲突与竞争。故美苏争霸,是公开性的大国博弈,主要围绕意识形态来竞争,突显价值观之争。美国化解对日本战略焦虑之时,双方是属于盟友关系,没有政治、军事上的竞争,只是经贸领域的竞争。而且,美日之间是非均衡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本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其军事安全由美国保障,美日之间在政治上是深度交融无竞争,在经济上是深度竞争性与强依赖性。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是全面的、多元的,是建立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均存在全方位的深度交集之上的相互竞争。双方互动频繁,具有高度的互嵌性,“杀敌一万”难免“自损八千”。中美双方各领域形成的深度交集,意味着美中战略竞争兼具全局性和全球性。

3. 美国对付不同竞争对手的手段不同,对方反应机制也不同

美苏争霸表现为全球地缘政治长期竞争。美国侧重技术封锁和军事施压,并集合了盟友共同对付苏联,着力于意识形态之争,同时展开多领域竞争。由于双方经济交往有限,对抗政策受内部约束。

美日竞争以经贸领域为主,包括贸易冲突、核心产业控制、强制升值日元和金融战。美国从单个龙头企业、产业政策到整体贸易手段对日本展开全面遏制,再通过“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基本上是经济领域的全面遏制。由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且在政治上被压制,日本无法抵御强大遏制措施,只能被迫让步,最终失去竞争地位。

美中竞争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领域的全面竞争。从贸易战至以科技战、金融战为代表的产业全面“脱钩”战,涉及对全球资源创造、生产和支配能力的竞争。二是向全球展示未来发展模式之争,是关乎西方现代化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竞争。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双方均会不同程度受到国内多方约束,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凝心聚力,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美国的对华遏制策略,如寄予厚望的贸易战,对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影响巨大,还成为助推美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4. 竞争结果可能不同

美国对二战后两轮战略遏制结果非常满意,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失落的十年”。此后,美国把控全球的自信心不断膨胀,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例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策动“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乱局。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单极世界中,美国对外用兵42余次,比冷战时期高出一倍多。由此,间接显示了没有战略焦虑的美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的极度自信,对全球治理的把控无所顾忌。但中国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战略优势,强大的国家资源配置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国家,注定成为美国的一个超级竞争对手。中美未来战略竞争,取决于未来两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如何达到平衡。

六、对策思路

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已远超潜在亚太威胁,涵盖了更深层次的全方位战略担忧,并伴随着全面的对华遏制。

(一)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之下的全面战略遏制

中美贸易战以前,美国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地缘政治地位,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海权、科技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然而,自俄乌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已演变为全方位担忧,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和太空竞争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开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政策,积极组建国际联盟,旨在在国际舞台上合力打压中国。尽管美国一再强调要避免“新冷战”,但其对中国采取攻击性立场的战略导向仍然在核心问题上显而易见^[28]。这种态势表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正引领其对中国的全面战略遏制。

在这一新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以智慧来控制竞争的“烈度”,以避免升级为热战。这不仅两国之间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关系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因此,对中国而言,需要进一步坚定和强化和平崛起的战略定位,寻求超越两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开放、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寻求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智慧的外交和政治决策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中国同美国乃至国际的领导层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二)明确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长期性

二战后的历史经验清晰地展示了美国所经历的两轮国家战略焦虑时期,这些焦虑通过对挑战国长期的战略遏制策略最终得到解决,让美国成为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旦美国陷入战略焦虑,国家战略就会服务于解决焦虑,并秉持守卫霸主的地位,引导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资源来对抗崛起国的挑战。正如基辛格在2018年底所评价的那样,“中美关系已无法回到过去。”^[29]实际上,这种对抗同过去对苏、对日一样,对当前及未来中国的

发展构成长期的严重挑战。但与苏、日不同的是,基于人本逻辑的中国以人民至上为原则,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有序发展,避免了国内极化现象。在面对外来强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执行力,凝聚全国、全民族的力量来共同对抗外敌,这将挫败美国对华遏制企图。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这需要我们同美方构建一种全新的关系,基于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现状,应对未来美国可能采取的长期遏制战略。这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角逐过程,需要中国耐心、谨慎而有远见地制定战略,同时与美国建立一种稳定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吸取历史教训,不断适应和发展,以实现国家的长期利益和全球的和平繁荣。

(三)对美国全面战略焦虑所体现的巨大遏制力有承受力准备

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已经转化为一种全面战略遏制,从历史中循迹,苏联和日本都曾在美国的全面遏制政策下失败,这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虽然中国在多个领域与美国仍然存在差距,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和军事领域。中美贸易战揭示了这些差距,特别是在基础技术研发方面。此外,中美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和产业脱钩仅仅代表了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压力和地缘政治挑战,这种情势可能导致中美及全球范围内的“脱钩”和“断链”风险上升,不仅影响经济关系,还可能牵涉政治、军事甚至价值观。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国家战略焦虑可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动员全球资源来遏制竞争对手的潜力,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全方位性和战略性。

中华民族一直是拥有强大抗压能力的民

族。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进行自我发展,避免卷入“新冷战”。同时,中国应坚定“四个自信”,提升自身实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促进经济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与全球资源更紧密地合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遏制。

[注释]

- ① 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不断,战后所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总体上维系了大国利益分配和力量均衡的格局,却并未发展成为大国间的战争,世界经济也在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中发展。
- ② 2023年12月23日,拜登总统正式签署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超过8500亿美元。该法案包含大量涉台消极条款,比如授权未来5年提供给中国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建议“美台联合军演”“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军演”等。

[参考文献]

- [1] 刘建江,刘甲蒙,唐志良.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缘由、表征及应对思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4):63-70.
- [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M].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3-37.
- [3]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可持续?:对拜登经济学的再思考[EB/OL].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http://ciss.tsinghua.edu.cn/info/wzjx_mggc/6537.
- [4]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M].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45-262.
- [5] 张宇燕.中国GDP达到美国2/3这是关系质变期临界点[EB/OL].凤凰网财经, <http://news.10jqka.com.cn/20180408/c603791142.shtml>.
- [6] 刘建江.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三维成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2-90.
- [7] 欧阳向英.冷战期间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J].人民论坛,2018(11):37-39.
- [8] Kissinger H. America at the apex: empire or leader? [J].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1, 65(64): 9-17.
- [9] [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 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净言[M].孙晓燕,袁英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53-78.

- [10] 李巍.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5):54-80,6.
- [11] Blackwill R D, Tellis A J.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2-4.
- [12] Gray A, Navarro P.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J]. Foreign Policy, 2016.
- [13] 王湘穗.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症结是什么[N].环球时报, 2015-05-26.
- [14]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J].美国研究,2018(4):51-74,6-7.
- [15] Rudd K. How to avoid an avoidable war: ten questions about the new US China strategy[J]. Foreign Affairs, 2018, 22.
- [16]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清华金融评论,2018(7):24-25.
- [17] 严瑜.美国新版安全战略尽显霸权焦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10-25.
- [18] 美太平洋司令剑指南海 扬言只有武力能阻止中国[EB/OL].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8-04/11898314.html>.
- [19] 美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催台加军费 台媒发声[EB/OL].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c/7mVPtXoD74K>.
- [20] 再挑衅!拜登政府批准任内第十笔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EB/OL]. 观察者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116961058706717&wfr=spider&for=pc>.
- [21] 美媒公布数据,美军舰穿越台海次数创新低,西太局势是否逆转[EB/OL]. 锐度新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962829534207636&wfr=spider&for=pc>.
- [22] 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J].国际观察, 2022(3):70-96.
- [23] Dixon R. Is the U.S. in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how much worse could things get? [EB/OL]. Cos Angeles Times, <http://www.latimes.com/world/la-fg-china-cold-war-20180829-story.html>.
- [24] 章玉贵.产业政策的锅,美国甩不动了[N].环球时报, 2023-02-28.
- [25] 国合平:美国对外援助,“尊严”伪装下的谎言[EB/OL]. 环球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194877634609677&wfr=spider&for=pc>.
- [26] 数说阿富汗战争20年 美军付高昂代价,阿富汗人民苦不堪言[EB/OL]. 澎湃,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709436.
- [27] Onea T 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40(01):125-152.
- [28]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3/08/content_5677795.htm.
- [29] 回不到从前的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的世界[EB/OL]. 动态大参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654211194075319&wfr=spider&for=pc>.